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学习材料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1. 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 (1)
——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
2. 来自“天堂”的挽歌…………… (9)
3. 爱国者的寻求…………… (23)
——李大维谈台湾所见所闻
4. 我去香港的前前后后…………… (36)
5. 他为何去而复归…………… (40)
——记广州起重设备厂王鹏在香港的苦难经历
6. 我在澳门的四十八天…………… (47)
7. “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好”…………… (53)
8. 他们从幻灭中醒来…………… (57)
——两个外流异国的青年归来记
9. 海峡两岸相比较倍觉大陆生活甜…………… (68)
——访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孙流政
10. 我的选择…………… (71)
11.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获得新生…………… (77)
12. 美国人民正把目光投向中国…………… (83)
——詹姆斯·温纳瑞斯答读者问

历史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

——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

编者按：据原《新清华》编者按介绍，钱宁同志是我国著名泥沙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青年时期求学于美国，为世界著名的泥沙权威小爱因斯坦的门生。一九五五年，他毅然放弃未来的优厚待遇，冲破阻挠，返回祖国，献身于改造黄河的伟大事业。十年内乱期间，他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对党的信念始终不渝。前年春天他抱病工作，为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把我国泥沙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平作出了贡献。三弄向党表示了入党的愿望。他写道：“几十年的沧桑变化让我懂得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钱宁同志于今年六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面是他对水利系申请入党同学的一次谈话摘要。

能和同志们谈谈心，我很高兴。最近，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我这一生，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正确归宿。如今，就讲讲我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也向往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灾难，听到城

外炮声隆隆，自己吓得钻在桌子底下。后来逃进租界，常看见中国人受帝国主义管辖下的印度巡捕欺侮，我们骂这些巡捕是“印度阿三”。上海还有个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外国人把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是西方的一些社会渣滓到了上海可以耀武扬威、飞黄腾达。特别是“九·一八”失去东北以后，华北又接着沦丧，想想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非常苦闷，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办的《独立评论》，它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批评一些贪官污吏，指责国民党没有吸收有为之士参加政府。我觉得讲的有道理，幻想实行“好人政府”。后来蒋介石真的把一些知名人士拉进了政府，我很高兴。但很快发现，这些人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本来就是给国民党捧场的，但还遭到顽固派的排挤。政局毫无改观，对日作战一触即溃。在重庆，国民党官员照样贪污腐化，花天酒地，衣衫褴褛的农民被绳子捆绑着送往前线……整个国家一片衰落破败的景象。在失望之中，我又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阅读了许多英国政治学教授拉斯基的著作，认为他所主张的“三权分治”等等一套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我想应当出国去念书，寻找国家的出路。

抗日胜利后，出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考取了去美国的留学生。途中当轮船在夏威夷岛停泊时，这个旅游地的豪华舒适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在那里，公共汽车没有售票员，顾客自动把钱投进箱子里，这同国民党统治的污浊世界相比，真是强了不知多少。我自以为找到了治国的蓝本，当即写信给国内的爱人表达我的兴奋之情。后来，船又停泊在金门大

桥，其规模之雄伟，也使我为之神往，但这只是最初的印象。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我越发现：在表面繁华的掩盖下是惊人的腐朽糜烂。

旅美八年彻底击破了我的幻想

我到美国，先就读于衣阿华大学。到校后不久，学校学生会办的《衣阿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国、共两党有什么看法。我当时对共产党毫无了解，但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反感，便告诉记者说，国、共之争是我们自己的事，希望美国不要干预。采访前，记者说第二天见报，到了第二天，根本没登，却登了另一个与我同时接受采访的同学发表的反共言论。这件事使我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发生了怀疑。时间长了，才知道，报纸都是受制于垄断财团的，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谁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后台老板，哪里有什么绝对的自由？他们有时候骂总统，那是反映了财团内部的矛盾，总的来说，对美国政府是小骂大帮忙，有点象抗日时期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对共产党是让你“交出军权、政权”，这种报纸貌似言论公允，其实是假的。我在美国八年，经历三次竞选，看来很热闹，似乎人人有权去竞选，可是不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美金根本没法竞选。这么大一笔开销，没有财团支持，你能上台？共和党、民主党，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多大区别。

在上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到农场做工，认识两个雇农的朋友，我到他们家作客，发现他们与地主之间的贫富悬殊极大，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贫困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我们国家，生活清贫不会招来歧视，而在西方，有钱就有地位，没有

钱，连孩子上学去也抬不起头，给父母的内心造成极大痛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终究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这种精神生活上的压抑使人无法过活。人老了，命运更加悲惨，黑人就更甭提了。

美国的自然环境很好，许多家庭有自己的花园，但许多人精神生活空虚。青年人一会儿留长发，一会儿剃光头；两性关系混乱，社会秩序不安定。今年我去欧洲，发现裸体画、性堕落比过去有加无已，简直无法说。我的一个弟弟从美国来北京探亲，他说，晚上能带着女儿在长安街上自由自在地走走，感到很幸福，因为在美国，晚上不敢出去。我们的代表团在西德一个火车站附近差点遭抢；水利部有个同志在巴黎被抢个精光。他们知道中国代表团出国一般都不带支票带现金，所以专抢中国人，社会秩序坏透了。

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南方歧视黑人，西部歧视华人。我的老师爱因斯坦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他是世界闻名的泥沙权威，但因为他是犹太人，经常受到排挤。至于我们这些人，遇到的不愉快事情就更多了。所以，当我坚决要求回国的时候，我的老师说：“我理解你，你不愿意做二等公民，我支持你回去。”

新中国给我带来新的曙光

一九五一年，我拿到学位，清华给了我聘书，但时值朝鲜战争爆发，移民局通知：不准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回国，因为他们回国意味着帮助共产党政府，我们有一批同学到了檀香山还被押解回来了。美国政府天天喊的“民主自由”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不讲，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电影院放的新闻片尽是对朝鲜和我国领

土轰炸的镜头，实在无法忍受。我和爱人一见播放新闻片就不得不走出放映场，心情异常愤懑。但是，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我们也开始发现：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在改变。特别是在麦克阿瑟狂叫打过鸭绿江时，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美军一气打到三八线以南，使美国人大大震惊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一个美国老太太伸出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了不起。”当时确实感到中国人站起来了！大家大概很难体会旅居国外的华侨的这种感情。我们在国外的地位，和祖国的富强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我自己回归祖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于是，在美国东部的同学先开始串连起来，给美国总统寄信、给报纸撰文，积极进行斗争。直到一九五四年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梅祖彦同志冒着可能坐牢的危险跑出美国，转道伦敦来到日内瓦，找到我国的代表团反映情况。我们的代表团据理力争，美国政府不能不考虑，但仍然对我们进行威胁利诱。有一天我回家，两个不速之客坐在那里，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他们盘问我：“我们的国家这么富有，这么文明，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国呢？”我爱人回答说：“你们的国家再好，我们在这里也是客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两个家伙没话说了，又继续盘问我们和谁接触，谈了些什么，我才明白：我们已被监视很久了。同志们：这叫什么“绝对的民主自由”？有的同学还因为争取回国被他们关押起来，如果没有祖国做靠山，是不可能回来的。回国的途中，船到马尼拉，别人可以上岸，惟独我们这一、二十人被反锁在房子里。到

了香港，船不靠码头，只弄个小驳船押解我们，船上的旅客伸出头来，说参观“赤化分子”。而后由英国警车把我们押送到深圳。我们犯了什么罪呢？无非是想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

我哪里是什么“赤化分子”？刚回来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心里暗想：“我要好好为祖国工作，共产党最好别来洗我的脑筋”。到了广州，住在饭店里，正赶上搞“肃反”，那声势吓我一跳，看到批判胡风的标语，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我惊奇地发现，离开八年，祖国发生了真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给了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大家都为集体努力工作，集体搞好了，个人的生活也提高了。和美国不同，那里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赚钱，什么可耻的事都干得出来。我在美国好多年，但连邻居的名字都叫不出，因为互相不来往。在我们国家，领导有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在美国，骂总统可以，但不敢骂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司老板，否则把你解雇。有本事的人，老板笼络你；本事不大的就很惨，你想自由找工作，试试看！你找得着吗？

再从业务上看，在美国，我学了些理论，习惯于从书本里找题目搞研究。回国以后，一九五八年派我去黄河，沿河踏勘，一呆三年。以后又下去过多次，记了好几十厚本资料。我们国家为了改造黄河，动员大批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搞大规模的模型试验，这就为泥沙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我的老师爱因斯坦比我能力强，但他得不到资本家的支持，没有人乐意为泥沙研究投资，在很长时间里只我一个人当他的助

手，这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才能和群众结合，使泥沙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最近，碰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有的对我说：“如果你还在美国，爱因斯坦死后，他的事业理所当然地会由你来继承。”但我觉得，这些年我在国内的锻炼和成长，是在国外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理想，我们在为一个新的社会而工作。

克服自卑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有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原因之一是许多事情他没有经历过。譬如，有些同学热衷于搞竞选，我听听他们的言论，一点不陌生，好象是我年轻时信仰过的胡适等人的观点，经过几十年，现在又冒出来了，还有人拚命鼓掌。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这条老路走得通吗？有的同志喜欢把我国同外国做简单类比，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果单拿上海和新加坡比，我们的经济不比他们差。问题在于我们有十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一下子提得很高，不现实。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信，你来试试看！学术上也要分析，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许多外国专家对我们泥沙研究的水平估计不足，他们来讲课。开始我还认真记笔记，后来不记了，因为讲的好多是科普。去年，在中国开了个国际泥沙会议，我们邀请了三十几个外国泥沙专家，都是一流的。会议开下来，他们承认我们在泥沙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的国家主要是搞数学模型，我们结合生产，搞了大批实测资料，在这方面，许多国家不如我们。明年的国际大坝会议，委托我们做泥沙

方面的总报告人，从收到的国外论文看，我们的水平不比别人差，不能自暴自弃。

同学们提出的“为四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非常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不要光发牢骚，大家要同心同德，努力工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1981年12月5日《中国青年报》）

来自“天堂”的挽歌

杨泉福 王燕生

一封盖有“1983. 10. 30”邮戳的航空信从海外寄往中国。这是一封出逃者的家信。两年来，从信封到邮票，他家里的人都熟悉了。但这封信拆开后却不同寻常：“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再往下看，这分明是一封诀别的遗书。就在这信封漂洋过海的时候，发信人在异国他乡自缢身亡了。

这是一个在随团出访中私自出逃的人的悲剧。象所有的事件一样，有它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这里虽然隐去人名和地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思考。

机遇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

好的机遇都让他赶上了：

- 1971年，17岁，进某外语学院。
- 1973年，19岁，被选送到某大学外语系代培。
- 1974年，20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英语。
- 1976年，22岁，学习归来进某外事单位工作
- 1980年，26岁，随某歌舞团第一次出访。
- 1981年，27岁，随某京剧团第二次出访。

从1971年到1981年，也就是他从17岁到27岁的十年中，他三次进校学习，获得三次出国的机会。和他同龄的人，当

年扛着行李去北大荒插队时，他已经轻松地登上了出国留学的飞机；后来许多人拉家带口，还要上夜大、奔学历的时候，他又揣着大学毕业的文凭在令人羡慕的单位里出出进进了。

在动乱的岁月里，人们常常受机遇的摆布。有时它能出人意料地推举一些人，有时它又常常无情地埋没一些人。机遇对这个年轻人的确够照顾了。

当然，条件是党和人民给他创造的。当他踏上我们国家出类拔萃者的台阶的时候，他应该更多地想到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想到创造和奉献。但恰恰相反，他的心思又用在谋划新的“机遇”上了。当他认为另一种“机遇”来临的时候，他的履历表上却填下了可悲的一页。

——1981年11月3日，在随某京剧团出访时外逃。

——1983年10月30日，从国外传来确凿的消息，他在极度苦闷中自杀。

把他的经历前前后后连贯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在人的一生中，的确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机遇”，但“机遇”不过是提供了某种条件。在同一“机遇”上，有人可能做出可歌可泣的事，有人却可能做出遗恨千古的事。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机遇”都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机遇”毕竟不能造就一个人。过错不在于“机遇”，恶果只能由褻渎“机遇”的人承担。

他为什么由“开明”变得“内向”了

1973年，来某大学培训的几个年轻人住在一个通铺上。夜里，两个小伙子被虱子咬醒了。这个说：“虱子是从你身

上爬过来的。”那个说“虱子还是闻着你的肉香。”嘻闹了一阵，又都呼呼入睡了。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年轻人，可见，那时候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后来，他变得“内向”了，开会或闲谈的时候，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话也不肯多说。偶尔从别人的话中听出一点怨气，他常常借火助势地插上一两句。个别的一件事，经他一“点拨”，似乎就成普遍性的问题了。

仔细观察这种性格的变化，还是可以发现内在逻辑的。几年来，国内、国外交错的生活经历，在他的头脑里逐渐产生了两种积累。

一种积累来自国外生活：摩天大楼还只是在电视里影影绰绰地出现时，他早就出出进进习以为常了；家用电器还只是在橱窗里展览时，他早就亲自享用了；“民主”和“自由”别人还只是在国内一般地谈论时，他却已经沉醉在异国那“民主”和“自由”的雾霭之中了。

另一种积累来自国内生活：想买辆名牌自行车，左转弯没有门路，他感到恼火；准备结婚了，可房子还没有着落，他埋怨“在中国要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西单墙”被取缔时，他更为不满，“这又算得了什么？”……

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变化。两种“积累”就象两个电极，常常在心头碰撞起火，最后归结为两句话：“国外，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当他觉得现实和自己的想法格格不入的时候，既要发泄，又要顾到一条防线，这时，他由开朗变得“内向”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内向”，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性格的扭曲往往只是在一定的场合。心里的话总还要在别的机会透露。

他曾经是团员，但后来他越发觉得组织生活是一种负担了。他是他所在单位超龄团员中第一批退团的。别人退团时，对团组织还一往情深；而他呢，倒觉得从此以后，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

他也曾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是在老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写的。但他递交申请书之后，就不知应该干什么了。也许，他以为人们的政治信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示，而不是精神世界的革命。他更不知道，人们对党的信仰和追求，不仅需要言语口头的表示，尤其需要亲身的艰难的实践——这里包括，党在顺利的时候，和党同心同德；党在困难的时候，和党同舟共济；党在奋进的时候，和党一路高歌。

他也曾和女友谈过政治。他的女友——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当他把国内国外的对比感袒露给他的女友时，女友问他：

“你总说外国好，是一切都好吗？你老说中国不行，是什么都不行吗？”

“你又没去过外国，你当然不了解外国！”

女友叹息道：“你要是能看点辩证唯物主义的书就好了。”

他呢，满肚子的不高兴。本来，这种思想交流是有益的，有助于矫正他思想上的偏颇，但是，他渐渐把这作为一种多余的纷扰。他提出，以后见面不谈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

他的女友对此为他担心过，说：“你可以不搞政治工作，但不能没有政治头脑！”他的亲属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你说你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偏偏要找你；你如果没有正确的政

治观点，错误的政治观念就要侵入你的生活……”这种善意的劝导，都被他当成了“说教”，当成了耳旁风。

团组织，他退出了；入党的意愿，他逃遁了；政治生活，他远离了……理想的阳光开始消失，心灵的灯火逐渐熄灭，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将走向何方：

危险的情绪在他心里升级

在国外的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在图书馆。当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出国选购图书时，他同意了。但后来一了解，出国要排在几年之后，他又不干了。为了调到外事部门当翻译，他左一个报告埋怨大材小用，右一个申诉强调不能丢掉口语。为了发挥他的才能，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一方面得意洋洋，另一方面他又耿耿于怀：“这里太不自由！”

他在婚事上也是这样。1981年他准备结婚，因为女友还在大学学习，领导希望他推迟婚期，按规定大学生学习期间不能结婚。这下他又恼了。通过其他途径，他开出了介绍信。当结婚证拿到手的时候，他不再得意，只是恨恨地骂道：“不人道！”

就这些问题来说，他也应该满足的了。可是，以怨报德的危险情绪在他的心里升级：由对一个人、一件事上升到对一个规定、一项政策；由对具体的规定和政策又升到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一个成熟的青年，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顾大局，识大体，懂得体谅和谅解。体谅就是合作，就是支持，谅解就是调

节，就是分担。个人的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八十年的青年应该着眼于祖国的未来。这一切，对一个在动乱中成长，和祖国和人民共忧乐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似乎一切都隔得那么遥远。十年内乱，他多少留下一些伤痕，但幸运很快给他弥补了。17岁他离家学习的时候，世界观还近乎空白；19岁一下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的舞台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东西明显占了上风；回国之后，本应该清除掉那些腐朽的东西，但他却以“内向”的方式把这些掩盖起来了。

牢骚和不满一次又一次上升，“美梦”一次又一次闪现，防线快要不攻自破了。

希望寄托在“天堂”

一个忠于祖国的人，即使长期生活在海外，他也会觉得自己始终踏着祖国这片土地；一个拿定主意外逃的人，即使窥探到一个机会，他也仿佛进了“天堂”。

1981年10月，这个年轻人作为翻译随某京剧团出访。11月3日晚，当最后一个国家的一场演出圆满结束后，演员们都去参加招待会。席间，忽然有人问道：“咱们的翻译哪去了？”开始人们没有在意。见多识广的翻译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了，不必自始至终陪在这儿。人们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半夜了，房间里仍然不见翻译的影子。他能上哪儿呢？这时，一位细心的同志向团长报告了一个危险的迹象：他的牙具不在了，提包也不在了。人们的心格登一下，莫非他……

人们不愿轻易用“莫非”这个字眼推测一个人，但是此人的去向又恰恰是到了那“莫非”的地方。

当地警方正在查询这位年轻人。对外交礼仪颇为熟悉的他，此刻显得手足无措了。

——你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问明他的身份后，郑重地告诉他：

——留在这里，对你，对我们，就没有好处，你要再三考虑。

年轻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送上门来，却受到对方的冷待。他十分尴尬、难堪，低着头重复了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向他讲明当地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留下可以，找工作不可能。

年轻人仿佛此刻才明白：这里不是礼宾司，不需要外交辞令；对方是冷峻的，对他并没有兴趣。他只好有气无力地再次重复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希望”，“希望”，他在别人面前讲了三次“希望”。人们常常要讲到自己的希望：一个爱国者，总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振兴和富强上；而这个年轻人的希望却是投眼在异国的土地上。有的人讲起自己的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扬；而这个青年讲到自己希望的时候，别人投去鄙夷目光，这种希望是没有任何光彩的。

出逃的目的，他总算达到了；但进入了“天堂”，景况并不那么美妙。